

新旗

第五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關於政治暗殺

振聲

反動黨派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手段，是愈來愈兇惡了。從昆明聯大慘案，校場口滄白黨等事件一直到下關毆打，都可以稱為『集體恐怖』，而旬日以來，昆明的兩位民主派李公樸與聞一多之被人暗殺，却已走上了個人的恐怖。

就恐怖說，無論其為『集體』或『個人』，原都是一樣的，所以反動性也是一樣的。但以此來估量恐怖實行者的地位與企圖，却有所不同。集體恐怖，就是唆使出一些特殊訓練的人，充作『軍人代表』、『農會代表』或『難民代表』，用辱罵，毆打，或鎗殺等等恐怖手段，來同民衆作對，來破壞他們的鬥爭。這當然是卑劣的，因為明明是『政府的一些人』或『黨部的幾個人』(邵力子語)，要鎮壓這些民衆的進步運動，却不敢自己露面，不敢用堂堂正正的政治主張或政治行動來對抗，而總是躲在後面，叫自己人戴上了假面具，也裝做對等的『人民』。等到事體鬧大了，把責任推在警察分局長那樣的小官身上，讓自己裝着正人君子。這種勾當是卑劣的，因為他殺傷民衆而又不敢把殺傷的責任負在肩上。

不過比之於個人恐怖却還是光明得多了。至少他還是以『官衆』來對抗民衆的。雖然責任推在警察局長或司令長官身上，雖然司令長官撤職以後反而會高陞的，但至少官方總是負了一點責任，換句話說，政府至少還有勇氣負擔一點責任的。

講到個人恐怖就不同了。這兒用不到什麼『代表』，純粹是『個人的』，就是說，任何人或任何機關都不必替那個兇手負一點責任，却同樣地達到了目的，同樣地把最討厭的政治敵人殺死了。雖然

事情太清楚，連稍有政治常識的小孩子都能明白：這是一樁政治暗殺，其責任應該由被殺者的政敵負責，但究竟更容易逃避責任些，更容易裝做第三者些，真正的兇手還可以出告示，下命令，去斥責『反動分子』，去『限期破案』，萬一民情過分的憤激，輿論責備得太兇，甚至也真的可以『破獲』這個兇殺的『個人』判以徒刑或明正典刑的。

就『政治家風度』，就責任感上說，『個人恐怖』當然比『集團恐怖』更卑劣些，更惡毒些。

不過我們所關心的却不是這些風度上，我們所注意的是由這些事件表示出來的恐怖實行者的地位。一個統治集團，爲了反對他的反對者，連一點責任都不敢負擔，那末但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明他處境的不可穩了。一個在野的政黨，如果放棄了教育羣衆與組織羣衆的工作而採取了個人恐怖，那她就完了，因為她已經不相信自己的前途，不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終於能獲得大多數羣衆的信任了。一個不相信羣衆的黨，羣衆也不會相信他的，結果自然沒

第五期目錄

關於政治暗殺.....	振聲
解決失業與合作工廠.....	鎮遠
女工們應有的自覺.....	雲弟
非律賓底國內戰爭.....	蘭因
第三國際解散後的各國共產黨.....	三男
革命問題漫談(續).....	蘭因
日本羣衆鬥爭的開展(日本通信).....	穆德
竊國大盜袁世凱(書評).....	郭溫源
中國革命悲劇(續).....	舒嚴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有別的，只是自身的死亡，俄國十九世紀最有名的恐怖主義者便是這樣消滅了。另一方面，一個處於統治地位的黨，由於他對反對黨派的手段，也可以看出其地位來的。最穩固的統治是放任反對派的，一切派別都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完全自由，對於政府的批評，祇叫不是惡意的人身攻擊，是絕對容許的。因為她相信有絕大多數人民擁護着她。

其次，較不穩固的統治，便預先制定了許多特殊法律來拘縛反對派，等待反對派鑽進圈套，便以法律來裁制他們。再其次，便是法西斯辦法了，調動自己特殊訓練的羣衆去反對政府的羣衆及其領袖，根本不再談什麼法律。再次才輪到以個人恐怖維持其存在的統治，這個統治，因為牠的地位太脆弱了，與民衆的對立太尖銳了，以致見了自己制定的法律都覺得害怕，對於自己特有的羣衆都覺得不能信任，而祇能信託着一些極少數的『個人』，使他們以一支手鎗（還是無聲的！）來支撐自己。

所以實行個人恐怖的統治是脆弱的，動搖的，絕望的。但爲此，我們是否可以強作寬容，對這些恐怖行爲故意不理，靜待那個脆弱的統治，自動放棄這個卑劣手段呢？當然不可以。反動黨派之所以從羣衆恐怖走到個人恐怖，一方面固然表示牠之愈加走入牛角尖，而另一方面，也由於遭受恐怖待遇的人們太『寬容』了。從昆明聯大慘案起一直到下關事件，每次都是不了了之，尤其不應該的是下關事件，我們受打的代表竟如此的以『和平爲懷』，不願深究，以致恐怖黨人的胆子愈來愈大，越發的肆無忌憚了。所以對於昆明最近這兩次的政治暗殺，我們絕對的不能輕易放過，絕對的要抓住這案子，要由民衆代表組織罪行調查團，徹查這案子，不僅要從法律觀點上辦到懲兇與人身保障，而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從政治觀點來反對政治暗殺，確定這暗

殺的政治責任，要把暗殺責任完全放在反動派統治者身上，必須以羣衆的組織力量，用示威以及較此更爲有力的羣衆的鬥爭行爲，迫使反動派立即解散特務，立即懲辦該暗殺案的直接與間接的責任者，立即讓各政黨合法存在，立即做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完全自由。

我們萬分同情於李公樸聞一多這二位民主戰士的慘遭暗殺，我們萬分希望這二位的鮮血不致白流，能多少給我們換來一些民主權利！

解決失業與合作工廠 鐘遠

日本投降到現在，將近一年，上海工人在此時期，除在業工人爲生活改善的鬥爭外，最緊要的要算失業工人的就業鬥爭了。

上海工人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已經過着長久失業的痛苦。幾十萬的失業職工，有的回鄉，有的跑碼頭做單幫，他們在敵人刺刀和拳足之下求生，在飢餓線上掙扎！

『抗戰勝利了』。一般飢寒交迫的失業工人以爲從此可以有工做，生活就可安定些了。但十個月來，嚴重的失業問題沒有得到一點解決。不懂『接收』過來的大部分敵僞工廠沒有開工，就是已開的工廠，因爲美國貨潮水般湧到，競爭不過舶來品，亦紛紛關廠了；再加上後方工廠的停閉，大批失業工人的來滬，上海失業工人問題更加變得嚴重了。

上海失業工人和後方來滬的失業工人，爲了要飯吃，已自動組織了失業團體，向社會呼籲，向政府要求，以爭取就業的權利。

可是政府當局是怎樣對待失業工人呢？牠的辦法是：（一）分發一點點救濟麵粉；（二）口頭敷衍失業工人的要求；（三）用武力壓制失業工人請

願。政府始終沒有定出保障失業工人的辦法。不錯，最近社會部和總工會提出了合作工廠辦法。這個辦法，依照提倡者的意見，是這樣的：『由政府移撥被沒收的敵僞工廠與機器，由政府或邀請資本家投現款資金，招收失業工人做工，將一部分應得工資充作股份。』

據說有了這種工廠之後，不但失業工人可以有工做，而且還可以馬上當老板，事情倘然是如此的，那當然好極了。不過我們假使仔細想一想，就可見事情並不是如此美滿的。這計劃中的『好的』部分是不能實現的，而能够實現的地方却總是不好的。真相如何，讓我說來：

（一）有利可圖的工廠（如紡織廠）早就被政府拿去『國營』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處理』的那些敵僞工廠，都是賺不到錢的，至少一時間賺不到錢的，那末政府是否有大量的閒資來做不賺錢的事業呢？私人資本家當然更不必說了。

（二）退一步說，假使政府能拿出大量資金，來辦合作工廠，把失業工人收容進去，但若工廠管理完全由政府派人主持，工人得不到監督工廠之權，則這樣的合作工廠，就是變相的平民工廠或游民工廠，把失業工人當作游民一樣收容起來罷了。

（三）由工人以投資方式，購買廠方股票，成爲工廠的股東一分子，這實際上還不過是用一種巧妙方法來壓低工資罷了，工人現在普通所得的工資已經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如果再要抽出一部分來『投資』，那簡直是要工人餓死之後做一個名義上的『股份老板』。

（四）工人要想改善生活待遇，必須要有權利用怠工或罷工手段來鬥爭。而在合作工廠中，照朱學範說：『工人應履行其規定之義務與權利』，用句我們工人懂得的話來說，就是說：既然做了『股

份老板」，再不能以工人資格罷工了。這是要工人自己保證取消罷工權利。

由此看來，合作工廠的計劃一半是幻想，一半是欺騙。所以大規模的實行是不會來的，這就是說，輸連部分地解決失業問題都是不可能的。小規模的，試驗性的合作工廠也許會出現，那末我們爲了這一部分工友們的利益起見，必須要預先指出：如果政府，官僚或私人資本家來和工人們「合作」開辦工廠，工人們一定要提出一個條件：工人監督生產。因爲說句老實話，工人對於這些貪污成性的官僚或老闆們是毫無理由可以相信的，同時，既然全體工人都是「股份老板」了，那末當然更有資格選舉工廠委員會來監督工廠。

既然合作工廠制度絕對不能解決目前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那末究竟應該怎樣辦呢？依我們意見，最要緊的是要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聯合起來，爲實現下列辦法與要求而奮鬥：

(一) 失業工人統統聯合起來，組織各業失業工人團，再由各業失業工人團，組織失業工人總團。這些失業工人組織與各該業的工會密切聯絡，要求老工人復業。

(二) 嚴格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以便增添人工，但須維持原有工資。

(三) 失業工人要求政府命令工廠，商店，作坊按利潤的百分之幾，抽作失業工人救濟金。

(四) 失業工人要求政府建設失業工人寄宿舍和食堂及治療所。

(五) 失業工人要求把關了門的做僞工廠或私人企業，當作公衆的事業，重新恢復工作，並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

(六) 在業工人應組織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產，保障失業，防止資方無故開除工人，閉歇工廠。

女工們應有的自覺 雲弟

在這次「六·二三」大遊行中，婦女占了大多數，其中尤以女工的人數最多，情緒最好。她們熱烈地唱着民主的歌，激昂地喊着反內戰的口號，起着積極的作用。這是一個富有意義的事實。這事實不但表示出我們女工們在覺醒了，她又表示出大時代在臨近了。

婦女，時常是報告大時代行將來臨的燕子。因爲她們，首先是勞動婦女們，乃是這社會中受着最深痛苦的一個人羣。她們受着男子的壓迫，受着社會的歧視，又受着資方的加倍榨取，這些勞動婦女是最痛苦的，最容易爆炸出來的。所以每到社會矛盾達到頗爲難忍的時候，婦女總首先忍不住了，喊出來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爆發於三八婦女節，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因巴黎婦女的麵包示威而加深起來，這都是鮮明的歷史事實。

戰爭對於婦女的壓迫是頂頂重的，她們不但獻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兒子，而且還得挑起戰爭時期慢性的，但是十分難受的日常生活重担；至於身體的被踐踏，孩子的被踐踏，以及家園的被破壞，這些痛苦，也只有婦女知道得最親切。所以婦女是最愛和平的，最反對戰爭的。

中國打了這許多年仗，婦女們身受的痛苦已經够多了，現在又要打內戰，她們當然反對得比任何人更激烈。這就說明了婦女爲什麼如此熱烈地參加這次反內戰遊行的原因。

不過一般的婦女是分散的，大多數限制在自己的家庭裏。她們對戰爭的反對，對一切現狀的不滿也還是少，組織又不容易，所以力量不大，女工中真正能把女人的痛苦宣達出來，而且能够積極地走上門爭之路的，只有我們女工了。

因爲中國目前主要的工業是輕工業，女工很勝任，同時加上了資本家的有意選擇，他們看中了女工的比較聰慧，工資又比較的輕，所以上海工人階級中，最大的部分竟是女工了。最近，根據工會的統計，上海有組織的女工達二十萬，差不多占了全上海在業產業工人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數字。

正在展開的民主門爭中，將占着多麼重要的地位！不過占了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我們女工們應該覺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更應該培養我們自己，組織我們自己。我們是有自知之明的。女工們有太多的缺點，爲要担負起落在我們肩上的責任，我們一定要知道這些缺點，努力改掉這些缺點。我們女工的第一個大缺點，就是缺乏自信。因爲歷來受着壓迫，處在這男子中心社會裏，我們女工，整個的，每月賺幾個工錢已經好得了不得了，許多人，根本做夢也想不到還要鬥爭，更想不到政治鬥爭，有時因爲真正受不住痛苦而鬥爭了，那也不過是短暫的發洩，不容易組織起來，長期鬥爭的。今後我們一定要去掉這個毛病，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女工團結起來（自然和男工在一起），是有極大力量，非但可以爭到自身的改善，而且對「國家大事」，也能够發生極大影響的。第二，我們女工對政治比男工更沒有興趣，許多女工的思想與生活，都還脫不了普通女子的方式，多賺一點錢，添製幾件衣裳，把整個心思都限制在自身或家庭方面，大部分女工是連對於工會都沒有興趣的；第三，女工的教育程度一般的比男工還要低，大多數不識字，祇有少數人能寫信，看得懂報的那就少極了。

上面所說的三個毛病是必須克服的。開始做起

我們女工應該儘量進夜校讀書，學習看報，留心政治，全部加入工會，以自己的力量實現工會領導的民主化與工人化，總之，我們要覺悟到我們在這時代所負的責任的重大，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而首先要培養自己的力量。

菲律賓底國內戰爭 蘭因

菲律賓共和國舉行了極的獨立典禮之後還不到十天，我們就從通信社電報得知這個新獨立國已在進行劇烈的國內戰爭了。據申報所載，聯合社七月十二日馬尼拉電，菲律賓政府軍隊和反對政府的遊擊隊，目前又發生了衝突。反對政府的遊擊隊，名曰「人民抗日軍」，是太平洋戰爭初年八打雁半島被日本攻陷後不久所組成的，其中成分農民佔絕大多數，現在已發展到三萬人以上，所有武器係自戰場取來，日本的，美國的都有。聯合社又說：「呂宋中部因此不斷處於恐怖狀態之下，其中人口最密之巴姆邦加，泰拉克，布拉干，新埃西蓋等省，米產將大受影響。」

像菲律賓那般國家，一個遊擊隊活動範圍遍及四省，人數達到三萬以上，又有新式的武器，——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難怪美國通信社替牠報道出來，而中國親美派報紙也不能不登載牠的消息。但我們莫想從政府派的通信社和報紙得知這反政府派的遊擊隊活動真相和意義。日本已經投降了，在菲律賓的日本軍隊已經成爲俘虜，繳出槍械了，爲甚麼還有「人民抗日軍」存在呢？這支遊擊隊究竟爲了甚麼原故同政府對立，同政府屬下的軍隊進行戰爭呢？關於這些，聯合社並沒有告訴我們。

幸而我們有一張美國出版的反政府派報紙，牠能告訴我們關於這支遊擊隊的詳細消息。

據這張美國報紙說，這支遊擊隊本名「Hukbun」

「Hukbun」，并非一九四二年八打雁半島陷落後才組織的，而是太平洋戰爭以前六年就組織了。牠是一種政治的組織，以土地革命爲目的，即要沒收地主貴族底土地，把來分給農民。牠自然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但尤其反對菲律賓資本家和地主，因爲他們長久剝削和奴役農民。

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攻進來了，「Hukbun」於是實行大規模的遊擊戰爭，抵抗這新侵略者，因爲農民希望菲律賓能脫離美國統治而真正獨立，却不願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來代替美國做菲律賓底主人，何況這新來的是比美國更殘暴野蠻的日本？在戰爭中，「Hukbun」曾企圖與美國軍隊和菲律賓正規軍商談成立聯合戰線，爲純軍事的合作，但并不放棄其政綱，并不停止其對於本土地主的鬥爭。當時做菲律賓統帥的麥克阿瑟拒絕這個合作，而且加緊進攻這個抗日的遊擊隊。「Hukbun」祇好單獨行動了。

日本佔據菲律賓期間，武裝的農民從山上衝下來，攻佔了大地主底土地，拿來平分，拒絕納稅給日本或其傀儡政府。如此便犯了「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不償還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激惱了美國帝國主義。所以日本失敗，美國重來以後，這枝遊擊隊受了嚴酷的打擊。從今年元旦起至五月間止，據估計，有七百名以上這支遊擊隊員被美國軍隊或非律賓軍隊所殺死。雖然如此，遊擊隊底勢力還是日加一日擴大的。現在呂宋中部已有四省完全受他們支配了，大地主底大地產也分成了小塊發給那些耕種此地產的農民。

農民這種行動是必然的，因爲菲律賓資本家佔有土地并非過着普通地主底生活，而是過着美國帝國主義未來以前西班牙舊式貴族底生活。地主窮着極愁，農民則流了一天汗祇能得到三角美金工資，

住的是茅草房子。在巴姆加邦省，百分之一的人口竟領有了百分之九九的土地。戰爭起了，美國帝國主義和菲律賓資本家要農民幫他們打仗，祇好許諾戰後實行民主和平等，現在農民就是拿着這些空頭支票要求兌現。「Hukbun」底行動，不用說，是得到菲律賓全國廣大農民羣衆擁護的。

美國帝國主義看見菲律賓正規軍力量不足對付農民遊擊隊，便利用另一種遊擊隊，名曰「Datu」(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in Far East)的，到呂宋中部山上去討伐。已經接觸過好多次了。「Datu」是地主成分的遊擊隊，其中含有戰時與日本合作的分子。巴姆邦加省省長，林郎根，明白承認：「若非美國訓練有素的陸軍派來維持和平和秩序」，他就無法做他的省長。正是因爲菲律賓有大批美國軍隊駐紮，這支農民革命軍才局限於呂宋中部四省之內，而未能向大火一般燃燒全菲律賓國。

菲律賓這支遊擊隊鬥爭的消息，使我們覺悟：無論那個國家，外國軍隊侵略進來時，統治階級底抗戰和被統治階級底抗戰總是分道揚鑣的，前者即使不妥協，也是以能逐出侵略者爲滿足的，後者則不憤反對美國侵略者而且反對本國統治者。必須農民有土地，工人有組織自己工會和罷工自由，一般羣衆有民主權利，然後抗戰才有意義。我們敬祝菲律賓革命遊擊隊繼續鬥爭，直至獲得經濟的獨立和軍事的獨立才能放下武器；即是說必須美國海陸空軍完全退出菲律賓，而非律賓經濟上不再爲金元集團底附庸時候，才能罷休。爲此又必須反對那些與美國合作的人，那些資本家，那些過着西班牙貴族生活的地主。

最後，我們希望馬尼拉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能團結起來，響應呂宋中部及其他各島的農民戰爭，領導他們，走向最後勝利道路。

國大問題的癥結何在？

三男

七月三日國民黨的最高國防會議通過了國民大會將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同時據國民黨的宣傳部說，政府還將『自動改組』。共產黨與民主同盟方面對此提出了抗議，所持理由是：當初國大延期既然是由三方面決定，則此次再度召集自亦必徵取三方同意，今政府以片面行動出之，所以共黨與民盟方面不能受這一決定的拘束；這是從手續與程序上說的，還有政治上的理由，即當初共黨及民盟方面同意召集由國民黨佔有百分之七十的國大，是以政協會全部決議的實施為條件的，今政協決定的其他事項都未實行，有的且被推翻，那末單獨召集國民黨可以壟斷的國大自無意義。

共產黨與民盟的這個抗議自然是有理由的。何況國民黨七月三日的這個決定，並非簡單地要表演一下『民主的』喜劇，牠含有更陰險的用意，就是這樣的決定之後，國民黨表示再不愿意跟共產黨或其他在野黨派作任何商談了，牠關閉了一切談判之門，而決定用『國民大會』與『民主政府』的名義來討伐『奸匪』，平定『內亂』了。因為這個欽賜的『國大』即等於內戰的正式宣告，所以我們不站在共產黨及民盟的理由上，而簡單站在反內戰和平的立場上，也必須反對這個決定以及或將召集的所謂『國民大會』。

不過，在完全超出於既成黨派利益的我們看來，共產黨與民主同盟對於國大問題所取的態度，也還是不正確的，他們都沒有給國民大會以應有的重要性，都不十分看重這個問題，彷彿都把國民大會看成一個民主的幌子，把牠抬得很高，但事實上誰都沒有認真地當牠一會事。這個態度，在本年一月間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上，以及後繼的一切政治商談中，極明顯地表示出來了。人們在這些會議上爭執得最激烈的，是政府改組問題，軍隊比例問題，憲草問題，未來政府的機構問題，一句話，是官職的分配問題，鎗桿問題，地盤問題，至於如何能真正的讓全體人民出來對政治發言，如何讓他們以國家主人資格來解決國家的一切根本問題，則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政府是不用說，牠因為和民衆的對立太尖銳了，牠害怕民主，所以在這問題上爭持得最堅決，非讓十年以前由國民黨一手圈定，派定或『選定』的代表出席不可。這當然是萬分荒謬的。十年以前的代表，即使是真正用民主方法選出來的，也決計不能再代表十年後今日的民意了，何況那些代表根本與人民無關！國民黨這個荒謬的主張，

本應該嚴厲地加以打擊，絕對不能與之妥協，如果中共與民盟確實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確實把國民大會看成目前中國最迫切最主要最根本的一個問題，那末他們就該以這一問題的圓滿解決，即保證能在最短期間以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普選方法產生全權的國民大會，作為談判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可惜那時候中共與民盟並不這樣做，他們聲嘶力竭地爭執了關於政府改組的問題，却馬馬虎虎地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妥協了，承認了十年以前由國民黨指定的『人民代表』繼續有效。這是大大的錯誤，大大的不應該，以致人們對政協會得到了分贓會議的印象，以致人們相信中共與民盟事實上具有這樣的意思，即把政府的改組所謂『聯合政府』看成第一，而國民大會則不過是黨派商談妥協之後，再用一個『人民』的名義來加以核准罷了。

或許他們以為，祇叫『國大』能核准黨派協商的結果，祇叫牠能夠通過一部『憲法』，那不就是國民黨十年前準備好的國大也行。這態度是十分不對的。為什麼？因為三個黨派的談判顯然不能代替全體人民的意見，而通過了憲法，即使是最理想的憲法，如果沒有一個全權的真正民主產生的國民大會，便不能使憲法發生絲毫力量。中國現在所缺的不是好看的法律，而是真有力量的民主政權，所以根本問題是國民大會問題，而非憲法問題，更非政府改組問題。

所以依我們之見，中國目前一切民主派別或個人，應該集中一切力量來爭取一個真正民主的與賦有全權的國民大會，要認定祇有這樣的國民大會，才有資格與力量來解決國家的一切根本問題（自然也包括種種黨派的問題）。至於政府改組，或所謂『聯合政府』，那我們認為是暫時不必談的，因為中國究竟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政府，祇能由國民大會來決定。如果像上次的政協一樣，以國大讓步的條件來換取政府改組，那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違反革命利益的。

不過有人會說，先做到了政府的『民主化』，然後再在國大問題上逐漸謀補救之道，不是比在『壞政府』的控制之下進行國民大會運動好得多嗎？

我們不同意這樣的意見，因為第一，目前中國已達到了這樣的地步，非但牠的歷史任務，便是一的一些迫切問題，都非經過最徹底最激烈的民主改造不可了；第二，代表着帝國主義，金融買辦官僚資本與大地主的現統治機構，非但不能在這個『改造』上盡點力，而且是主要的妨礙者了；第三，在野黨派派

代表參加這個『壞政府』，組成『合作的政府』，其效果非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替『壞政府』裝上了『民主的』飾物；第四，這樣的『合作政府』非但不能『補救』不民主的『國大』，而且難免了廣大民眾為真正民主的國民大會而奮鬥。

因此，我們認為，目前國民大會問題的癥結所在，不是什麼國民黨之片面地或非片面地決定召開日期，亦不是『是否履行了國大問題妥協時允諾的條件』，而是中國一切為民主而鬥爭的人，是否認識了國大是目前一切問題中的問題，因此集中全力來為之鬥爭，在這問題上毫不妥協，絕不能讓反動黨派拿去作獨裁的偽飾，作民主的掩護。

所謂『毫不妥協』，自非關於國民黨行將飲餒的那個『國大』的召開日期或代表名額的分派等等問題，而是關於國大產生時的徹底民主，國大的權力以及其全部政綱。因此，目前我們對於國大問題的態度應該是這樣的：一，絕對反對國民黨行將召集的十年前由他一手指定的國大；二，也不贊成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等在政協會議上與國民黨妥協的國大，因為百分之七十的代表担在國民黨手裏，根本不會有絲毫民主意義的；三，我們認為在國大問題上絕對不許做一點買賣，由幾個現成黨派的代表參加政府，絕對不能代替或交換由全體人民普遍選舉的國民大會；四，停止一切無聊的商談，拋棄一切有毒的幻想，我們應該集中全力來爭取一個由平等直接不記名的普選方法產生出來的全權的國民大會；五，如此產生出來的全權的國民大會，絕非一個發現政府立法的全權機關，而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他應該解決國家的一切根本問題，牠首先要解決政權問題，要建立一個真正符合於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府，其次要解決軍隊問題，要靠全國民眾及兵士大眾的幫助，立即改編一切軍隊，實行軍隊的所謂『國家化』與『人民化』。這兩個問題一解決，那末目前糾纏不清的什麼鎗桿與

第三國際解散後的各國共產黨

七月十三日，申報有個令人注目的消息：

『本報訊，舊金山十二日廣播：法國共產黨與蘇聯聯繫切斷至今已十分明顯，緣皮杜爾政府中之共產黨部長，不願莫洛托夫所發表蘇聯政府反對四強割裂德國之聲明，已斷然全力支持法國之各項要求，即：魯爾區與德國

實行政治經濟上之分離，法國佔領萊茵區，以及與薩爾保持關稅及工業聯繫。』
 法國資產階級一百多年來處心積慮欲得德國境內魯爾區重工業，薩爾區煤礦和萊茵區『天然疆界』，正如德國資產階級欲得法國境內阿爾撒斯和洛蘭兩州一般。人們記得俾斯麥，忘了拿破崙，彷彿

以為德國資產階級是侵略的，是懷有野心的，而法國資產階級則是被侵略的，自衛的。其實二者是一貨色，不過後者實力不如前者，所以拿破崙以後我們祇見法國割讓阿爾撒斯和洛蘭兩州給德國，而未見德國割讓魯爾，薩爾，萊茵諸地給法國罷了。現在，正當德國遭逢有史以來最大的失敗，任憑他

防區問題，亦即內戰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再其次，這個國大應該立即沒收土地給耕種的貧漢大眾，藉以解決最迫切的飢荒問題。應該立即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並實行勞工管理生產，藉以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與生產停頓問題。前自然還必須力反現政府一切依存外國的政吏，爭取民族的真正獨立，同時又要實行國內諸小民族的自決。最後，這個國民大會當然要徹底保障一切人等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完全自由。

祇有把一切力量歸納到這個國民大會的鬥爭上去，才能使中國走出目前那個苦悶的僵局，才能使中國在政治經濟方面都發生出新的希望與新的力量。

不過，有人又會發問，在『壞政府』底下如何能取得這樣的國民大會？同時，這樣的國民大會萬一產生，如何能保證有這樣大的權力？不會得流於空想嗎？

對此疑問，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對國民大會本身的幻想是比任何人更少的，因此我們從來認定，要使真正民主與真有權力的國民大會實現，必須靠基層羣眾，尤其是工人與貧農的有組織的鬥爭力量。如果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廣大無比的城鄉貧苦民眾興起了，而且組織了，他們為這樣的國大而鬥爭，那麼這樣的國大一定是能實現的。同時，我們也從來肯定，國民大會的權力不是由牠本身來決定，甚至不是由牠的代表來決定，而是由國民大會以外的羣眾的鬥爭力量來決定的。我們為國民大會而鬥爭，並非看重牠是一個完美的機關的靜的方面，而是看重，能喚起廣大鬥爭羣眾的政治覺醒的動的方面。因為如果沒有廣大羣眾，尤其是工人羣眾的直接干涉，而讓國家的全部命運繼續操在少數幾個官僚與政客手裏，什麼問題都不會得到絲毫解決的。

是時候了，立即拋棄一切協商，談判，請願的勾當，集中一切力量，為一個直接平等不記名普選的全權國民大會而鬥爭！

蘭因

人宰割時候，法國資產階級之乘機索取魯爾，薩爾，萊茵諸地是勢所必然的，不足引起我們驚異。

申報這個消息令我們驚異的，是自命為代表法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竟斷然全力支持法國資產階級這個傳統要求。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俾斯麥要求法國割讓阿爾撒斯和洛爾兩州時，亡命倫敦的德國人馬克思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會怒沖沖地投函英國報紙公開抗議。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發生，法國為索還兩州兼為奪取魯爾諸地而作戰時，法國社會黨左派及工團主義者一部分人便反對戰爭，便與列甫共同參加齊默瓦爾和京達爾會議。這些人後來構成法國共產黨底核心。

一九二三年，法國藉口德國不付賠款，派兵佔領魯爾，法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不僅提出抗議，而且在佔領軍中積極活動，要求撤兵，并鼓勵法國兵士與當地德國工人聯歡。

但是現在，同一法國共產黨，不僅不反對法國兵駐紮德國，而且積極贊助法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德國領土的傳統要求了。由此可見，墮落到甚麼地步。

申報這個消息又令我們驚異的，是法國共產黨在國際政治上公開與蘇聯對立，即公開反對蘇聯共產黨底處理德國政策。法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會同屬於第三國際，二者本是兄弟黨。難道第三國際解散了以後，這兩個兄弟黨便在敵人面前公然內訌了麼？

法國共產黨閣員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一個要求德國割地，一個反對德國割地，——這也許是唱雙簧的罷，如蘇聯外交所常表現的？一般人看到申報這個消息，很容易作此假設。我們也很願意

作此假設，即設想二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一致的。不幸，除了申報這個消息以外，我們還有其他的信息，證明這個假設不能成立。

首先，我們記起了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報登載的另一个簡短的消息：『中央社二十一日巴黎電，德法兩國共產黨已因薩爾問題而反目。』我們又記起了某日上海大公報所載，朝鮮共產黨反對蘇聯主張的朝鮮託管五年計劃。由此可見互相衝突的不僅限於法蘇兩國共產黨之間了。中文報紙看不見的，還有以下的消息：

本年春間，莫斯科真理報曾猛烈批評瑞士共產黨（在瑞士名『工黨』）底政策，說牠縱容『銀行家』、『反動派』、『奸細』混入黨內，說牠採取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是不能團結民主力量的。

稍前一點，德國共產黨在魯爾問題上公開攻擊波蘭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因為魯爾區脫離德國，而德國共產黨則經過牠的副主席烏爾布里希特之口宣言：『魯爾始終是德國的，是『我們的』，沒有魯爾，『我們』便不能生存。』等等。

稍後一點，意大利共產黨書記局寫了一封信致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特里斯特港問題。這信於四月廿三日和廿四日在法國報紙上公開發表，其中明白採取反對南斯拉夫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的立場，信內說：『意大利民主派雖然一致門爭反對意大利民族主義底復活，但也是一致願望用不同於法國共產黨所提的方式來解決特里斯特港問題。』這類消息，即各國共產黨站在本國資產階級利益立場而公開衝突的消息，是層出不窮的，以後還

會更多些。

這種事情在第二國際屬下的黨，則是司空見慣了的。一九一四年，列甫喊出『第二國際死了，第三國際萬歲』時候，為的是甚麼呢？正是為了各國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不願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擁護各自的資產階級底領土要求。有了這個前車之鑑，列甫時代的第三國際屬下各黨，才未曾為了本國利益而互相衝突的。列甫死後，一直到不久以前，雖然第三國際於三年前解散了，屬下各黨也是未曾為民族利益互相衝突的，即是未曾將這衝突公開出來。正是為了這個原故，去年冬天英國工黨社會主義左派機關報『倫敦論壇』在『新共產主義』一文中有以下的論斷：

『共產國際底解散并不減輕各國共產黨政策底國際協調作用。這新戰略本身即是國際性的。在現時猖獗於歐洲的民族衝突之中，各國共產黨提出的對策是預先經過相互協調的，又經過與俄國政策協調的，雖然各自用愛國的理由來說明這種對策。』（見今年一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轉載）

『新共產主義』一文底著者，如果看見了上述種種事實，今年春天才發生的事實，不知將說甚麼話？總之他去年所說的話，今後已不適用了。各國共產黨在民族衝突之中已不能預先協調其對策了。

這並不是說今年春天以前各國共產黨相互間沒有為各自民族利益而發生的衝突。由現在的事實看來，可見這種衝突早就有了，不過以前還能暗中互相協調的，現在則衝突到了如此尖銳的程度，非公開鬥爭不可了。

上述種種消息初看雖然令我們驚異，但仔細想來仍是容易索解的。這種衝突底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大林底拋棄世界革命和採取一國社會主義論。在這

新路線之下，起初各國共產黨祇有在資本主義國內保衛蘇聯利益的作用，而沒有為世界革命利益領導無產階級作用了。後來，一方面人們拋棄國際主義，他方面為反對法西斯和保衛蘇聯起見，人們又須助長沙文主義（一名狹隘的愛國主義）傾向；戰爭發展，沙文主義如火燎原，遠遠超過了莫斯科所需要的限度，於是共產黨自身也成了沙文主義的黨，不僅相互開門爭，而且與蘇聯國際政策處於對立狀態了。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由此，我們對於三年前史大林正式解散第三國際事件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解釋了。以前，我們都解

革命問題漫談（續）

六

穆德

共產黨在理論上借毛澤東底筆明白寫出：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這個階段底完成，『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肩上了』（新民主主義論），至於完成以後，則『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同上）

以上徵引的兩段話，需要加以說明。共產黨，或至少毛澤東一派，對於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不敢同我們一樣堅決斷定：屬於無產階級。毛澤東還認為資產階級有領導可能：『如能盡此責任』。資產階級既然兼有革命性和妥協性，則理論上，在未來『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之中，也是能佔據一個位置的。實踐上，則共產黨要求參加國民黨政府，服從國民黨領袖，信奉國民黨主義，簡直是承認資產階級底革命領導權。但我們僅僅指出這一點，關於領導權問題，上面已經說够了，不必再討論下去。至於革命後的社會，則既然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了。以後我們還要分析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或『新資本主義』，如某些共產黨員所坦然承認的。

釋做：史太林為了外交，為了循羅斯福和邱吉爾要求，把那死了多年的第三國際正式埋葬。現在看來，這個解釋仍舊是正確的，但還不完全，因為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理由使史大林非解散第三國際不可，那就是各國共產黨沙文主義傾向發展，使得國際協調一天比一天更困難，國際組織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存在了。還是解散了，好些。

我們現在可以明白，至少歐洲各國共產黨做的是甚麼事情了。法國共產黨拚命爭得魯爾區仍歸德國所有，德國共產黨則拚命爭得特里斯特港歸屬於南國，意國共產黨則拚命爭得特里斯特港仍歸意國所有。如此

首先我們要反駁的是共產黨底『兩段革命論』。毛澤東在上引書中有一專章替這個理論辯護而反對所謂『一次革命論』。他認為『一次革命論』有『惡意的』和『無惡意的』兩種，前者是國民黨中人，他們認為『甚麼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義裏面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三民主義并不超出資本主義範圍，并不包含社會主義革命在內。此外，毛澤東這連反對國民黨中人的話，自有國民黨中人去答覆，我們對此沒有興趣。反之，他反對『無惡意的一次革命論』的話，則值得抄在下面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們，他們似乎并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祇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祇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我們不知道，所謂『無惡意的一次革命論』者，究竟指的是甚麼人？他們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究竟是怎樣說的？我們也是反對『兩段革命論』的，但我們不是主張『一次革命論』，而是主張『不斷革命

類推。『魯爾區』、『特里斯特港』等等，屬此屬彼，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看來，難道能解決歐洲問題麼？一般說來，歐洲仍舊保存諸國分立狀態，無論邊界維持現狀或大大修正，能够相安無事麼？現在歐洲的問題并不是一區或一港應歸誰有問題，而是過去諸國分立狀態應否存在問題。惟有『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的歐洲合眾國』才是問題底真正解決。

必須回復列甯底國際，重新舉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才能解決歐洲問題。在此旗幟之下，各國的黨將不會有衝突了，至少決不會有為各自資產階級利益要求而互相衝突了。

論』。『不斷革命論』應用到中國具體條件，就是說：中國革命無論怎樣開始的，若非不斷發展至於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便不能完成。在這革命不斷發展過程當中，不僅『不容橫插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而且不容橫插所謂『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而中國未曾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不能單獨在一定時間預先完成的，而必須與另一任務，即社會主義任務，合併完成。換一句話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祇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地完成。

爲甚麼革命非分爲兩個階段不可呢？爲甚麼祇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呢？毛澤東沒有向我們解釋，他僅僅提出來作爲無需證明的命題。事實上，另一命題：資產階級革命必歸資產階級領導——一般，這個命題也不是超歷史的法則，而是受歷史所決定的，即是說：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是真的，在其他歷史條件之下則不是真的，在現在十月革命以後中國條件之下則決不是真的。二十世紀以前，資產階級革命當然是歸資產階級領導。門雪維克派把這個事實當作超歷史的法則，因此主張俄國革命應歸資產階級領導，因此將無產階級導來的政權送給資產階級，若是沒有布爾雪維克派出來主張俄國革命應歸無產階級領導，恐怕一九一七年就沒有成功希望了。與此同樣，以前的革命確是非分爲兩個階段不可的，確是祇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的，可是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起，情形就變了。試拿這個革命來說，編曾明顯分爲兩個階段麼？沒有。他是先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麼？不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經過是這樣的：二月，無產階級和兵士暴動起來，推翻帝制，把政權交付於自由派資產階級手裏；鄉村農民響應城市運動，起來與地主階級鬥爭；但從二月至十月，土地問題並沒有解決，其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也未會解決；這八個月中，革命深入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權在不斷動蕩之中，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無一刻穩定；十月，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城市從工人監督生產迅速發展爲沒收資本家一切產業，在鄉村從農民全體反地主的鬥爭迅速發展爲沒收資本家一切產業，結果解決了土地問題。如果僅從政權推移一點來決定革命性質，那麼一九一七年革命確是分爲兩個階段，確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經過八個月無產階級才取得政權。但一般說來，革命性質不是用政權推移來決定的，而是用任務解決來決定的，共產黨一向是如此決定革命性質，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非完成於十月以前，而是完成於十月以後，即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而此革命（主要土地問題），即使不是完成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生產機

關公有制）以後，至少也是同時完成的。如此一來，革命就不可分爲兩個階段的了，就不是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了，而是互相糾纏，互相依賴的。總之，這個不斷的革命過程之中不能橫插以甚麼『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俄國革命如此，中國革命更可知了。以政權推移來說，中國資產階級至遲於北伐成功之後，就完全掌握政權了；以任務解決來說，則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不僅不能由資產階級來解決，而且不能由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範圍內來解決。無產階級要解決這些任務，不僅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專政，二者是同樣意思），而且必須同時，甚至更早些，剝奪中外資產階級財產權，宣布土地公有制，與其他無產階級國家聯合等等。總而言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祇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地完成。不是一個革命至另一個革命，而是兩個革命互相糾纏，互相依賴，至於不能分離。這中間是沒有甚麼新民主主義階段可說的。

需要說得更明白些麼？那麼我們試仔細考察中國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兩個所謂主要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我們所謂民族獨立，并非形式上獨立之意，并非被列爲世界五強之一或四強之一之意，亦非脫離日本壓迫而獨立隨即成爲美國附屬的殖民地。真正的民族獨立乃是脫離全世界帝國主義束縛之意。但是中國不比其他的殖民地，中國乃是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底安全活瓣，其他殖民地獨立了，帝國主義制度還能存在，中國獨立了，帝國主義制度就要受致命傷，非出全力壓迫不可。如此龐大的任務，不僅資產階級不能担負，中國一國無產階級也難於担負的，必須依靠世界革命力量，使中國革命本身帶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以此加入世界革命爲其一部分。

我們所謂土地革命，也非同先進國一樣僅僅反對封建地主之意。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結了不解緣，不僅不會援助農民反對地主，而且要援助地主反對農民。土地革命就是反對資產階級本身，此革命發展必須至於鄉村貧農佔用富農土地和城市工人剝奪資本家工廠時候，才能成功。可是這個歷史上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必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的。

反駁了『兩段革命論』之後，共產黨革命觀其他諸點就容易批評了。

共產黨還在把中國革命定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這是錯誤的。

共產黨還在認爲中國革命之後須經過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才能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也是錯誤的。（未完）

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著，一九四五年九月寫成，香港丘引社出版，無出版年月。

陳伯達先生這本新著拉我們後退到一個時代去，這時代距離今天不過一世代（三十年）長久，但在青年人看來，好像同八股文，瓣子，小脚，鼻煙壺一般，屬於一去不返的時代，應當放進歷史博物館去了。現在這本書拉我們到那個時代去，或甯可說把那個時代從歷史博物館拉出來，放在我們面前。根據陳伯達先生底分析和判斷，青年人可以明白那個時代還不能放進歷史博物館去的，牠還活着，還有無窮盡的線索與我們這個時代相連，還可以在這個時代找到牠的影子。

這就是陳伯達先生百忙中著作和出版這本書的用意。他恐怕讀者不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封面書名旁邊還添寫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八個字。

我們很贊成陳伯達先生這種研究歷史的態度，即他不是為歷史而研究歷史，他仍是為現實而研究歷史，他首先在歷史當中研究那與現今最相像的時代，爲了有所借鑑，幫助現今問題的解決，避免重覆過去的錯誤。一般說來，人類對於過去歷史發生興趣，不是爲了解決現今問題，又是爲了甚麼呢？但是歷史固可借鑑，歷史也永不重覆的。袁世凱時代和現今時代之間，固然有許多共同點，但其根本性質則是完全不同的，這本書底缺點就是過於注重『袁世凱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權術，其手段，其政策，其口號』（見第八一頁），而忽略了做這一切的社會基礎，因此有許多極重要的教訓未能

日本羣衆鬥爭的開展（日本通信）

郭溫源

記者按，這是郭溫源先生寄來的日本通信總名『動盪中的日本』之第二篇。第一篇名『舊思想在崩潰中』，見本刊第四期。

前信說到由於日本舊統治因戰爭而削弱等原因，羣衆反抗鬥爭必然激化，現在就拿事實作證明罷。首先要說的當然是工人的罷工，據日本官方厚生省調查，本年正二兩月勞資糾紛爲二百七十六件，參加人數爲三十萬六千餘。三月份勞資糾紛爲九十一件，參加人數爲八萬六千餘。日本當局方高興與工潮『大爲減少』，但是過了三月，又復報告『勞資糾紛月有增加』，僅『工人管理生產』事件，自投降起至今年五月二十日止，已達一百零三件。自六月以後雖尚無新統計發表，但是只拿最近發生的幾件重要的鬥爭來說，已足以證明日本工潮仍在向上發展。

第一件當然要推四十萬郵工的大罷工。日本郵政員工，因生活困難，向當局提出要求，於六月二十八日得當局回答後，六月三十日在東京中央電報局講堂召開會議，到各地代表及郵政工會幹部約三百人，討論結果，認該回答不能滿意，乃決議罷工，立即改工會本部爲鬥爭本部，通電全國，並向各分會發出罷工命令。氣勢簡直有點像『軍事行動』。

郵工罷工開始後，一般官業也有追隨的趨勢。日本各官業工會所組織的全國官公業工會協議會組織了共同鬥爭委員會，於七月二日在中央電報局開第一次會議，討論鬥爭方針，結果因鑑於官業與公共生活關係極大，特設『預告期間』，宣言如當局再無適當辦法，將於十五日採取有力行動。

在這裏要特別附帶申述的是：過去日本工人中最進步的要推若干大金屬工廠工人，至於官業工人，一向都在改良主義的影響之下，屬於『黃色』工會，但是到戰後情形似乎已經大大改變了。

第二件值得提及的，是東京市政府員工的『自行管理工作』。東京市政府各局員工聯合會向政府要求『突破糧食危機資金』，每人千元，經交涉無結果，遂於六月二十一日實行所謂『業務管理』，即不罷工，亦不怠工，照常辦公而不受當局管束指揮，該聯合會包含東京市立醫院醫師及看護在內，擁有會員五萬人。『業務管理』發生後，社會黨東京支部立即出面進行調解。此事雖聽說於前數日已『圓滿解決』，但如前面所說，日本官業工人又有罷工趨勢，是否不能再被捲入漩渦，尙成疑問。

在中國，於戰後曾發生法院變相罷工，即全體『請假』，這還表示法官們的相當『守法』，不敢違犯『罷工』禁例，而日本的公務員們却已不如中國公務員的馴良了。他們已老實不吝氣自居於『主人』地位，向當局反抗。關於這一點，等到下篇通信中和工人的『生產管理』參照，更可以看出日本大衆鬥爭在『質』方面的進步。

在公務員中，居特殊地位的，要算警察。警察的職責，本在維持社會『秩序』，但是到了一定情況下，這維持秩序的人自身也要破壞秩序了。日本警察雖未至與工人取一致行動，但是從下面一段消息中，已可看出警察的態度也在改變。

抽取出來。

陳伯達先生認為袁世凱時代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今的中國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袁世凱時代是大地主大買辦統治，現今也是大地主大買辦統治。這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底認識。我們姑退一步承認這個認識是對的，但著者也應當告訴我們：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三十年前的和現今的究竟有甚麼不同？同是大地主大買辦統治，三十年前的和現今的究竟又有甚麼不同？我們既然不能說這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完全沒有變化，就應當把這不同指出來，可是翻遍全書，我們找不到著者在這一點上有甚麼說明。

事實上，這相隔三十年的兩個時代，社會性質和統治階級二者之差別都是很明顯的。即使一九二七年以前的時代是大地主大買辦統治，那幾年以後的時代就是大資產階級統治了（或大資產階級領導地主買辦的統治）；即使那以前，中國是「封建殘餘佔優勢的」半殖民地社會，那麼那以後，中國就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的半殖民地社會了。

書中有一句自相矛盾的話，著者說：一九二七年以後，「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國主義，把無量數的人民納在血海裏面，建立了新軍閥的朝代——大地主大買辦統治的新時代。」（第八一頁）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大革命，這是事實；但以後既然大資產階級未曾放棄其統治權，則至少應當說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買辦聯合統治，為甚麼祇說「大地主大買辦統治」呢？大資產階級到那裏去了呢？難道牠現在還是受壓迫的，能革命的麼？可見，先定一個公式，即認為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性質和統治階級沒有改變的公式，然後強納歷史事實於此公式之中，往往要自相矛盾的。

六月二十八日衆議院開預算審查會議時，某議員質問稱：日本警察待遇倘不予改善，恐對維持秩序有不良影響，政府所見如何？大村內相答稱：對於十二萬之警員，為改善其待遇，預算上已列入一千五百萬元；當可防止警察力之降低。立於議場門前之警察得聆內相此種聲明，發表感想稱：其實照現行待遇，我輩亦可做勞工所為。……

第三件值得提及的，是讀賣新聞事件。讀賣新聞的罷工，從人數來講雖然只有幾百人，但是它的政治意義却是很重要的。日本的言論界在很久的極端壓迫之下，一旦得着「解放」，當然要大吐積鬱之氣，所以一般說來，日本的報紙戰後都大大「民主化」，高談闊論。其中尤以讀賣新聞「左傾」色彩最濃，大觸當局忌諱，於是乃發生因革職而罷工事件。我們且看關於此事之記事：

讀賣新聞社職工因鈴木東民等五人之革職問題而罷工，繼續至六月二十一日午後，突來警察數百人，將正開常委會中之幹部及會員拘去五十六人。……

日本新聞通訊工會中央委員會認此為對於工會運動之不當干涉，於二十二日發表宣言稱：警視廳雖列舉暴力行為，不法侵入住宅為此拘捕理由，但彼等明白表示此乃基於公司方面之報告，且亦承認讀賣新聞經理請求彼等干涉職工組織之事實。……

關於上項拘捕事件，讀賣新聞社職工五百餘人於二十二日復開大會，指摘拘捕出於公司方面陰謀，議決一面向社長，首相，內相，警視總監提出抗議書，一面向社會黨，共產黨，協同民主黨及其他反吉田內閣議員提出陳情書。散會後立派代表等往謁木村法相及大村內相，指摘檢察當局昨日在衆議院答辯稱並未蹂躪人權為詭辯，希當局善為自處，結果由木村及大村允澈查真相後切實處置，始告辭而退。

戰後的日本當局對於工人罷工的態度，的確已比戰前緩和很多，為什麼獨對於讀賣新聞事件又擺出舊日的爭強面孔呢？由上面的記事，我們當然已可看出報社業主和政府當局的勾結。其實相勾結的還不止於日本當局和報社業主，美國駐軍當局也脫不了嫌疑。原來被報社革職的鈴木東民正是不久以前被麥帥總部禁止出席內閣會議旁聽的記者。由此蛛絲馬跡，會令人推想到報社業主之清除鈴木等，是受人指示或暗示。

以上是關於工人方面，我們轉個方向來看看農民方面怎麼樣呢？雖然日本政府對麥帥的指示之下規定了農地整理法，要收買地主土地分給佃農，以消滅土地所有的不平等現象，要改現物地租為貨幣地租以減輕佃農負擔，但是農民鬥爭並不因此停止。尤其因為糧食恐慌逼着日本政府採取「徵購」制度，至使各地農民採取各種反抗辦法。而一般人民為糧食而鬥爭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一)三月二十四日岡山縣農民同盟，社會黨，共產黨代表三百五十人在縣府前舉行示威，聲言政府徵購米糧，攤派不均。

(二)六月一日，農民搶米之事件竟發生於號稱日本穀倉之秋田縣。該縣東雲區須田村農民約三百人於該日午前三時許趨向城村東雲農倉庫，向值班人員直呼要米，值班人不允，農民遂侵入倉庫搬出五百包，但被附近警察局長聞訊趕來勸回。警察當局認為此次事件，具有組織性，並非單純示

雖然復據我們的認識，袁世凱時代和現今時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統治階級大不相同，但這並無害於三十年前的時代能為現今所借鑑。實在說，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再沒有一個時代與現今較有這麼多的共同點了。共同的，不在靜態方面，即社會性質，統治階級等方面，而在動態方面，即階級鬥爭形勢方面。

袁世凱時代是封建殘餘勢力（或前資本主義勢力）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舊勢力一天比一天趨於衰落，但新興階級羽毛尚未豐滿，不能代替牠的位置，鬥爭雙方相持着，於是軍隊取得『仲裁權』，或『公斷權』，或『最後決定權』（隨你的便），於是武裝的僕人坐到大堂上來以一家之主自命了。

現今時代則是已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更新興的無產階級及鄉村農民大眾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一九二七年的勝利並不能完全鞏固牠的地位，同時無產階級以世界革命軍隊一支資格也時時有崛起可能，現在又開始對政治發言了。鬥爭雙方相持着，於是軍隊又取得『仲裁權』等等，於是武裝的僕人又坐到大堂上來了。

從這個根本的共同點就派生出許許多多的共同點，不僅權術，手段，政策，口號等等是相同的，連風氣，習慣，思想，道德，甚至代表者底性格也有許多相同地方。這一切互相聯繫構成一個系統，祇要有某些因素出現，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也要出現的。

這種系統，我們不主張稱之為『袁世凱主義』，因為這也是舶來品，西洋早已有之了。

這就是有名的那那特主義（Bonapartism），或稱拿破侖主義。牠的誕生地是在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國——法蘭西。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

威運動。……

(三)三月間有大宗軍用物資為宮城縣生活擁護同盟所揭發，該項物資有一部分應配給予人民，該同盟乃要求縣當局即時配給其中食糧，同日聯合各民主團體組織仙台（宮城縣治所在之都市）市民生活物資配給委員會，向縣市當局共同提出要求，獲完全承認，結果隱匿物資已歸人民自行管理及監視。

(四)六月六日，日本共產黨發表該黨為解決糧食問題而努力之結果，稱……成果之顯著者如在東京地方動員兩萬人進行四十五件鬥爭之結果，遂獲得監視權，使數字公開。又組織市民糧食管理委員會，對應急米加以人民管理。關於地方農民獲得飯米運動，在十二地方展開農民鬥爭……由此等鬥爭共揭發米三千五百表（每表約一百一十斤），糖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貫（每貫為六斤四兩），鹽六萬二千二百二十貫。……

向統治者，剝削者鬥爭的，當然不限於工人和農民，凡是無法生活的，凡是感覺不平的，都會起來鬥爭。我在前信已經提過日本教員要求改善待遇的鬥爭，士兵報復官長的壓迫等等了。現在再來舉其他的例子：

五月十日日本全國漁村代表在東京成立全國漁村青年同盟，主張揭發隱匿漁業用資料，由從事生產之勤勞農民加以管理，以救濟八千萬飢餓民衆。十八日將決議文遞交農林、商工、內務各大臣，求其答覆。

在戰後日本工農民衆的鬥爭中，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政治性的加強。在前面所舉的例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鬥爭中所提出的要求，並不單純是經濟利益，而多半附有政治要求。甚至有若干鬥爭完全爲了政治目的。而鬥爭所用方法，除了罷工、怠工之外，如示威，如包圍佔領，如自行管理，也都表示日本工農大眾的政治醒覺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此類例證有：前述千葉縣農民代表之要求幣原內閣辭職；五月八日各勞動團體人員六百餘人向社會黨示威，五月九日復有勞動團體人員十餘人向社會黨示威，反對它和反動政黨合組內閣；五月十四日，日本勞動戰線統一發起人會開會決議幣原首相奏薦保守反動內閣，則於組閣命令頒布之翌日午前十時起動員全國工人舉行大示威運動。在許多羣衆運動中，尤其有重要政治意義的，要推以下三件事了：（一）四月七日的『人民大會』，（二）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三）五月十九日的糧食節。現在把這幾件事簡單敘述一下。

『人民大會』開會當日的情形，前信已經說過一點。當日羣衆會幣原不着，最後由荒畑寒村通電話至幣原私寓，直接交涉，幣原始允於八日下午與少數代表晤談。但是人民代表會見了幣原之後，並無結果，於是發表聲明稱：

人民大會反對政府強迫徵購糧食，反對排斥韓人及中國台灣省人，主張由工人管理生產及參加經營，要求幣原內閣即時辭職等議決案，當時提交首相，要求答覆，然均遭拒絕，吾人今後當盡力鬥爭，暴露此反動內閣之性格。而樹立真正人民政府。

講到勞動節，在極端反動政策的壓迫之下，日本勞動節已經有十一年未能舉行了。戰後，在『民主化

大革命重重打擊了封建貴族，但對外和對內兩重戰爭也削弱了資產階級，使之不能穩定其統治，於是拿破侖·邦那帕特Napoleon Bonaparte 起來，做執政，做統領，做皇帝，為各階級間的大仲裁者。資產階級暫時把一切權力付託給他，以便到相當穩定時候推翻他。一八四八年法國又起了革命，較急進的資產階級代替保守的資產階級獲得政權；可是跟在屁股後面，無產階級也起來了，牠也要政權。六月屠殺中無產階級雖然慘敗，了但資產階級政權仍舊穩定不下來。於是路易·邦那帕特Louis Bonaparte 起來，做總統，做皇帝。九十多年後，現在，貝當的政制和戴高樂底政制，就是邦那帕特主義底翻版呀！

不僅法國有這產物哩，外國也有。俾斯麥底政制就是德國版的邦那帕特主義。克倫斯基企圖在俄國翻印一個俄國版的邦那帕特主義，可是在列寧堅決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使他的企圖不能成功了。

袁世凱時代，我們有第一版的中國邦那帕特主義；現今則有着第二版。袁世凱是叔叔，現今則是姪兒了。邦那帕特主義雖相同，但其基礎是完全不同的。

邦那帕特主義既然是從互相鬥爭的階級相持不決之中產生出來的，那麼要消滅這個政制，除了代表進步的階級及其政黨採取更堅決的立場之外，沒有別的法子。

* * *

陳伯達先生研究了袁世凱之後雖然抽取了若干有益的教訓，但忘記了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即『聯合政府』的教訓。他好像有意隱瞞這個明如日月的歷史事實，他祇提到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和第三任內閣總理趙秉鈞加入國民黨，而未會提起真正的國民黨員與袁世凱黨羽組織『聯合政府』

』的潮流下才又復活。今年的勞動節不但警察表示不再濫行干涉，而且在若干大都會，電車也免費讓工人乘坐前往參加。

在東京，於事前多日即由各業工會，韓國人聯盟，各文化團體等五百餘個團體作準備，當日在宮城前集合，參加者約三四十萬人，舉行盛大集會。激勵演說自為不可少之節目。節目中最特別者為朗讀勞動詩，獻紅旗等。當時議決『反對保守反動政權』，『根除戰犯』，『由人民管理糧食』，『工作代價，飯須吃飽』等二十二項要求。繼而合唱勞動節歌，國際歌，旋即向全市展開示威遊行。會中並議決致書麥帥及對日管制委員會四國代表，感謝聯合國軍採取解放人民之措置，聲稱日本之工農大衆及其他人民立誓建設對日管制委員會四國代表，感謝聯合國軍採取解放人民之措置，聲稱日本之工農大衆及其他人民立誓建設民主政府，並謂日本官僚與資本家地主等統治階級欺騙聯軍，妨害聯合國軍之判斷，希望聯合國助日本工農及一般階級充分發展其民主運動。東京以外的各都市，今年也同樣熱烈舉行集會，全國合計，當日參加集會工人大約不下二百萬人。

事後內務省警保局談話稱：今年勞動節秩序甚佳，過去動輒與警察衝突之事件迄未發生，僅有大阪某統制工會人員五十八人被酒參加遊行略有爭論謾罵行為。

五月糧食節的大集會是五月十九日舉行的。這在事前也有充分佈置。在五月初，我們就看見報上有這樣的記載：

日本普選後首次會議定於十六日開幕。呻吟於飢餓線上之羣衆，擬乘機舉行一要求食米之大示威運動，除鐵路員工及全國總工會全體動員外，小學生及市民糧食委員會職員亦均參加。……

十九日當目的情形，據報紙所載：

五一勞動節甫過，二十餘萬羣衆今日又在宮城前廣場舉行大集會。九時許，全場大半已為若輩所佔，人頭蠢動，赤旗飄揚。參加羣衆，五形十色，一團體一律着紅短褲，胸前貼白布，上書『反對反動內閣，建立人民政府』。一青年隊頭上戴白帽。一羣小學生則揭『我們肚子餓了！』口號，由全校教師率領入場。十時許即有人登卡車十輛作成之臨時講壇開始演說，謂天皇何以不聞我等飢餓之聲，反動分子只圖壓迫人民呼聲，糧食應歸人民管理，分配必須公平，人民即須樹立民主內閣等等。一婦人背負嬰兒，代表家庭婦女立壇演說，要求糧食，一小學五年級生亦登壇發言，謂我等無飯帶到學校，以充中午飯腹，無心讀書。共產黨書記長德田亦登壇大呼結成民主陣線，樹立民主政府，要解決糧食問題，惟有改革政府機構。最後通過上天皇書。十時半散會，進行示威遊行。……

……行經難產中之吉田內閣組閣本部，高呼『打倒反動政府』，『要飯』等口號，難以國際歌及赤旗歌，午後一時，先頭部隊約千人，首先抵達預定解散地宮城坂下門前廣場，一舉擁至離門約五十公尺處。警察約百人圖以棍棒退阻，與羣衆發生小衝突，木棍與帽凌空飛舞，但卒為領導者所制，恢復秩序而散。

以上列舉事實雖屬掛一漏萬，但已約略可見日本羣衆鬥爭潮流之一斑了。但最足表現這潮流的，還在於鬥爭發展達到的階段，即工人管理生產階段。下篇將專門論述此點。

『這件事。他反而把民國初年的國民黨說做在野黨。但事實上那時國民黨并非在野黨。袁世凱底下第一任內閣，即段總理唐紹儀是不久之前才加入同盟會的。但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司法總長王寵惠四人是同盟會底老幹部。參議院中國國民黨員佔據多數。各省都督（今稱『主席』）又有十個是國民黨員。在此情形之下怎能稱國民黨為在野黨呢？第三任內閣，總理和國務員，都填了加入國民黨志願書。正式國會選舉，國民黨員佔據了多數，於是前任農林總長宋教仁要入京組織責任內閣了。就在離開上海那日被袁世凱派刺客刺死。

這就是國民黨在袁世凱底下組織『聯合政府』的經驗！十分悲慘失敗的經驗！當時國民黨最有遠見的黨魁孫文似乎是不贊成這『聯合政府』路線的。夏含華編的『中國國民黨之史的發展』中說同盟

各集團間不斷地戰爭，即使不是軍事的戰爭，也是經濟的戰爭。工業的操縱進而為財政的操縱，最深的海和最高的山都不能攔阻牠，牠衝破了舊中國的萬里長城。當落後的俄國和新覺醒的東方成熟至於革命時，世界已經大踏步前進走入帝國主義時代了。

這個改變後的世界現在擺在落後國家面前。落後國家必須大跳幾步，必須把其他國家走過的路程配合為一個歷史階段來走完。先進國和落後國間互相依賴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致牠們的政治命運不可分離，而落後國再沒有可能以一國為單位單獨地漸進地發展了。經濟上說，落後國必須從最原始的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跳到工業，交通和市場組織底最新技術去。政治上的跳躍亦不少遜，近代民主政制長期而緩慢的發展，必須於短期間內完成。還有一層，現在世界社會發展達到的階段，迫得落後國不僅必須趕上先進國，而且必須超過先進國。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生產力底桎梏了。國家障礙阻礙了生產力向前發展，因為

會改組為國民黨時，『總理孫先生頗不以為然，不問黨事，協理黎元洪亦僅掛名，事實上黨務集於宋教仁一人之手。』但無論如何，經過此次『聯合政府』失敗之後，孫文就堅決反對一切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之企圖了。段祺瑞執政時代，北洋軍閥勢力已經衰落，似乎『聯合政府』比在袁世凱時代更能實行些，但孫文嚴厲禁止自己的黨員參加『善後會議』，禁止自己的黨員接受段祺瑞奉獻的總長位置。孫文根據中國經驗深知欲完成革命必須新創一個政府以代替北洋軍閥政府，必須把北洋軍閥政府整個粉碎，而不能利用牠，不能混進牠的內部來擴大自己力量。結果就是這樣做了。他死後，他的諸繼承人，至少在這一點是遵守牠的教訓的。我們希望這個教訓能成為今後中國一切革命者底教訓。

馬克思經過巴黎公盟經驗曾寫信給德國友人，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威 譯

現在祇有國際規模的發展才是可能的。資本主義祇能用那造成大災難的戰爭來解決國家障礙和生產力發展的矛盾。在先進國，資本主義及其民主政制既然不能適合經濟發展之需要，那麼落後國更沒有希望在民主政制範圍內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了。落後國要向前進，就必須跳過整個的歷史時代，而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之設立走向社會主義發展去。這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國所做的。這個革命證明了惟有無產階級才能解決過去所遺下的問題和現在所提出的問題。

十月革命所以勝利，因為歷史發展過程已經註定生產力底增長必須依賴於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了。俄國工人所以能够履行這個歷史使命，又是因為有一個黨領導他們，這個黨認識了歷史發展底階級機構，而且發展了這個認識到異常深刻的程度。這個認識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西歐革命經驗和稍後的俄國歷史發展得來的。把這個認識綜合起來，又指示出來的，是共產主義偉大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後來俄國共產主義者列甯和托洛次基，——這四個人以其印記

說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底政治軍事機構，而不能利用這個機構。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中發揮馬克思這個教訓。他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始終反對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結果才有十月革命底成功。

馬克思和列甯祇說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利用資產階級政治機構，他們並沒有說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利用封建的政治機構。事實上，確有許多資產階級政黨與封建貴族組織『聯合政府』而得到成功的。但在中國特殊情形之下，革命領袖孫文已經覺悟，連資產階級革命，中國也不能利用舊的機構了。倘使反對滿州皇朝和袁世凱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那麼現今的革命就改變了性質。袁世凱時代已經不可組織『聯合政府』了，何況現今？陳伯達先生沒有抽取這個教訓，我們認為是很可惜的。

（舒嚴）

蓋在整個的歷史時代，而為其他的人所難企及的。

在落後國和在先進國一般，歷史底辯證法發展固然將社會進步積樁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交付於無產階級手裏了，但這還是不夠的。工人在經濟領域上起來反對他們的階級敵人時候，必須經過自己的經驗去認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歷史使命，必須鍛鍊鬥爭武器，即政黨，牠能領導他們在政治舞台上從事於獨立的行動。

階級鬥爭歷史，其一種很直接的意義就是被壓迫階級解除其對於壓迫者的奴服和依賴地位的歷史。當中古市民們再不縮瑟恐懼於封建公侯面前時候，為建立資產階級及國家的鬥爭就已提出於議事日程上了。一八四八年歐洲民主運動流產了，因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為工人和庶民羣衆行動所驚嚇，便將農民出賣給封建反动派，又容許卡魏雅克及其德奧夥伴去撲滅初興的工人階級運動。又有無產階級在背後崛起，資產階級便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和建立一個安定的民主政權了。資產階級祇好屈服於俾斯麥和路易拿破命一流人，祇好用革命以外的手段來部分地和枝節地解決問題。

從這些歷史事實結晶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二人研究了過去歷史，定出發展規律，自己又以無產階級革命者資格積極行動起來，——他們已經明白：工人在組織上和政治上必須有完全的獨立，形成一種社會集團，為未來底主人翁。一八五〇年，他們通告德國共產主義者說：『無產階級底黨，今後若不願受資產階級利用，跟資產階級走，如一八四八年的情形，就必須盡可能聯合一致，盡可能獨立，出現於鬥爭舞台。』無產階級底黨必須避免成為『官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附屬品』，必須『為建立工人底獨立組織而努力，；使每個城市市政府都能成為工人團體底核心，在其中討論工人底地位和制度，不受資產階級所影響。』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又可以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締結『暫時的同盟』，但必須小心警戒這些同盟者，又須不妥協地提出工人自己的要求，『以對抗資產階級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還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派是農民在城市中的同盟者，因之預計德國能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然而無產階級底黨，其任務還是在於設法不使革命停止在這個階段的。

他們寫道：『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務使革命能不斷發展，直至一切有財產的階級或多或少都被人沒收財產了，直至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直至無產階級大團結不僅在一國內實現了，而且在世界上所有重要國家內都實現了。……對於我們，已經不是簡單改變私產制形式問題了，而是根本廢除私產制

問題；已經不是調解階級對立問題了，而是消滅一切階級區分問題；已經不是改良現社會問題了，而是建立一個新社會問題。』(『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德國黨員書』)

幾年之後，馬克思又將他的指頭按在革命不斷性底根本因素之上。一八五六年，他寫信給恩格斯說道：『在德國，一切事情都要看能否有個農民戰爭底再版來擁護無產階級底革命。那時事情就是很好的。』德國結果并未走這條道路；但對於五十年後俄國發生的事情說來，馬克思這個預言幾乎算學一般準確地實現了。

一八四八年底教訓，以及後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盟底教訓(這二次革命給予世界以無產階級專政底第一個草圖)成了俄國馬克思主義主流即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源泉。正當其他較前進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者』沖淡了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的和國際的內容，以適應於其民族社會主義的進化的觀念時候，落後的俄羅斯則接受了最大膽的革命學說，如同牠的工業採用了最新發明的資本主義技術一般。列寧天才所發揮的布爾雪維克主義，是堅定地從工人階級在組織和政治方面都應無條件獨立之觀念出發的。『把俄國前途寄託於革命底國際性之中，於較前進國家工人協力之中。俄國工人運動其他一個潮流，即稱為門雪維克主義的潮流，則是從階級合作的實踐出發的，從俄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性質，因此工人必須服從資產階級——這個觀念出發的。與此觀念成一極明顯的對照，列寧則堅持：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祇有當農民跟着工人走而非跟着資產階級走的情形之下，才能徹底完成。至於工農聯合完成革命後成立的國家應屬於甚麼性質，則列寧拿來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用『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抽象公式表示出來。接着列寧之後，托洛茨基在理論上大膽前進一步，斷言：工農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之合作，祇有經過『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專政』才能實。這就是托洛茨基底有名的『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底根本前提是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將生長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此社會主義革命底最後勝利又祇能在世界範圍內達到的。歷史的事變把這兩個巨人底思想和行動綜合起來了，這些事變發生得比一般人所期待的更早些。

一九〇五年革命證明了，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祇要能討得帝制政府掉下去下的麵包屑，就可滿足的。所以在革命之後來的反動時期中，無產階級獨立觀念成為列寧底不間斷的母題。他寫道：布爾雪維克派『并不害怕與革命的民主派攜手共同打擊敵人，但須絕對遵守一個條件，即：不可混合組織，應當分別前進而聯合打擊，不可隱瞞利益衝突，應當警戒盟友同警戒敵人一般多。』一

九一七年，當門雪維克派努力導引革命進入資產階級軌道時，列甯寫道：『所有資產階級政客在所有資產階級革命中，都要空口許諾民衆，都要愚弄工人。』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工人必須擁護資產階級，——這就是取消派政客說出的無恥的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則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工人必須使民衆睜開眼睛，勿受資產階級政客欺騙，必須教民衆勿信任空話，應信任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團結，自己的武器。』

這就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基石。俄國專制制度阻礙了國家生產力底發展。同中國一般，俄國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和封建剝削形式也是交織不可分而併制着廣大農民羣衆的。在布爾雪維克派看來，這不是表示各階級能聯合一致反對帝制，反而是表示這些階級之間要展開相互鬥爭，而無產階級要走上前來爲農民底真正領袖。十月革命於是供給列甯那個『代數公式』（工農民主專政）以其算術內容了；或者用列甯自己的話來說，『生活使他走出了公式界而進入現實界，給他以血和肉，使他具體化，以此改變了牠。』實現出來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惟有牠能够領導農民戰爭至於勝利。布爾雪維克派和俄國工人期待其餘世界工人能與他們聯合起來，於是將大膽的理論化爲燦爛的現實。當戰爭摧毀了俄國帝制底最後支柱時，他們就把一個廣大的落後民族轉變爲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了。

從工人的俄國放射出來的革命推動力，瀰漫於戰後疲憊的世界，而得到殖民地民衆底應聲。戰爭耗竭了帝國主義的世界，直至其最弱的一環斷裂了，而十月革命使整個機構發生了動搖。戰爭使歐洲陷於癱瘓。戰爭又刺激了近東和遠東殖民地民族起來反抗。土耳其、敘利亞、埃及、阿拉伯、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安南、中國、朝鮮，——到處，被壓迫民衆都嘗試着去拆斷那因戰爭而薄弱的鎖鍊。對於他們所有的人，落後俄國底經驗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爲牠給人以理論的戰略的教訓，因爲牠投入一個新的客觀因素於世界政治中，即從此有個人國家，牠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去抵抗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壓迫。領導無產階級在俄國奪取政權的人，把一切希望都寄託於世界革命繼續發展之上；他們以如下的話解釋他們的國際主義道：『國際主義就是『一國無產階級鬥爭利益應從屬於國際無產階級鬥爭利益，而戰勝了資產階級的一國無產階級須有能力和決心作最大的民族犧牲以推翻國際的資本主義。』（見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通過的『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

他們這個主張并非建立於感情之上，而是根據下一事實，即世界社會主義改造祇能依靠『統一的世界經濟』之建立而實現出來，這經濟立足於一個總計

劃之上，而由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來調整，這經濟將資本主義所建立的世界系統繼續推進，達到完成。如此就『迫切需要轉變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僅存在於一國而不能施行影響於世界政治的）爲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即至少存在於好幾個前進的國家而能施行決定性的影響於世界政治的）』（同上）這個改造依賴於兩個底底匯合，即前進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和佔世界一半至四分之三領土及人口的殖民地被壓迫羣衆民族解放的鬥爭。共產國際在列甯和托洛茨基領導下成立時，牠的整個世界革命戰略就是建立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衆的合作上面的。在前者指導和援助之下，後者就能够脫離其種種落後程度而跳過資本主義去直接參加那屬於社會公有的世界生產力之組織和管理。這個勇敢的觀念就是國際主義底堅固的基礎，而此國際主義是與列甯之名不可分離的。

殖民地以及其他比較間接受列強統治的國家（半殖民地），其民族解放努力所表現的形式是受各自的經濟發展和階級對比所決定的。無產階級革命黨不應簡單地贊助那一般有進步性的民族運動，而應當分別甚麼階級能領導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最堅決地以解決國內問題爲手段，而推動國家向非資本主義前途走去。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席上討論這些問題時，列甯特別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分別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民族革命運動之必要。前者傾向於同帝國主義討價，祇望獲得那能令本國統治階級上層分子滿意之條件；後者則要團結人民大眾，在解決最迫切的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基礎上，從事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者是應當沿着這條道路走去的，應當領導羣衆反對本國剝削者，以此爲唯一的手段去進行民族解放運動至於成功。

列甯在他的有名的『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上寫道：『在落後國家贊助農民運動去反對地主和一切封建殘餘，是特別重要的。我們首先必須盡可能努力給農民運動以一種革命性質，組織農民和一切被剝削民衆爲蘇維埃。……共產國際負有任務，去贊助殖民地和落後國的革命運動，祇爲的能够團結各種分子成爲未來的無產階級黨（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并教育他們，使之明白自己的特殊使命，即是在本國內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傾向的使命。共產國際必須與殖民地和落後國的革命運動建立暫時的關係，甚至聯盟，但不可與之混合，必須保持無產階級運動底獨立性，即使無產階級運動尚在胚胎狀態亦然。』

爲了防止民族資產階級運動利用十月革命威權來『領導』無產階級運動起見，列甯特別警告『要進行堅決的戰爭，反對那些準共產黨的革命者拿共產主義外衣來披蓋落後國解放運動之企圖。』（未完）